

◀ (上接6版)

后果是安福系得势，氛围将更恶劣，且安福系与旧派学者关系密切，对新知识分子更加不利，“恐难免文字之祸”；二是运动者经过这些事情，“气焰过盛”，“甚难裁制”。夹在二者之间，复出不是明智之举。

傅增湘离职后，也南下苏杭，开启访书之旅。6月间张元济与傅增湘多次通信往返，张还借与傅500元，大约为傅购书之便。7月初，傅增湘到了苏州，住在友人费树蔚家。费氏是吴大澄的女婿，也热心社会活动，是当地有名望的士绅。8日午后张元济到苏州，“访沅叔不遇，又至曹家巷泰仁里访叶煥彬(叶德辉)，亦不遇”。原来当日傅增湘去拜访另一位寓居苏州的藏书世家之后莫棠。晚间傅增湘来到张元济住宿的维盈旅馆，“谈至半夜，宿旅馆中”。

第二天早上，张元济与傅增湘一起入城到书店聚集的护龙街访书。先到来青阁。这家书店店主出身苏州，在苏州、上海都有分店，在上海的经营规模很大，张在日记里写下在这儿见到的不少好书。而后“又至文津、文学山房、觉民书社”，“午后十二点廿三分乘车归”。张元济买的主要是方志，包括在来青阁购入价格不菲的《吴县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有一部《吴郡国经续记》三卷，备注“涵芬楼藏书，已未”，应该就是这次与张元济同行所见。这是一部写本，附有校勘宋本的校语，有题识显示这个写本是刻印万历二年长洲钱氏悬磬室刻本所用，傅增湘案云“钱氏刻本绝少见”。此本还有黄丕烈、顾广圻的题跋识语，难怪一部三卷的小书，花去了54元。同一日，在西湖畔的蔡元培致电新任教育部长傅岳霖，表示将不再固执初志，待胃病愈后即装束北上。

买书令人心旷神怡，不过幸福总是相对的。当年张元济赴欧美考察期间，写信嘱托孙毓修为涵芬楼留意各处佳本，孙毓修复函详述，则说“惟欧风美雨之中，犹以此腻尘残蠹相溷，殊觉不伦耳”。

《四部丛刊》与《道藏》

借影之不易

这腻尘残蠹，却是张元济尤恐沦亡的旧籍。大年初六日，张元济给傅增湘复己未年第一信，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四部丛刊》(初名《四部举要》)与《道藏》影印的安排。信中说：

影印《道藏》事去年为陈、葛诸人所阻，忿恨已极。其后因所议不成，拟改印《四部举要》，刻已动手。两事并举，断来不及，尊意欲抽印，未知拟抽若干种。如工事与《四部举要》无妨碍，弟亦甚愿为之。

影印《道藏》是一项宏大的工程，经过多方推动，到1918年6月已做好借书拍照的方案，8月下旬又拟定了《承印〈道藏〉契》。然而就在临门一脚的关头，白云观方面突然反悔，态度闪烁。到了10月，张写信给傅增湘大吐苦水“既要得钱，何以不早说，真闷损人也”，但后来终究没有谈妥。于是，傅提议正式由官方出面向白云观施加压力，他当时所担任的内阁教育总长的政治身份一直在推动《道藏》影印上发挥重要作用。但张元济又对《道藏》销路没有十足信心，怕万一由于预售数量太小而无法印行，会贻人话柄，“同人之意，以为官方一层断不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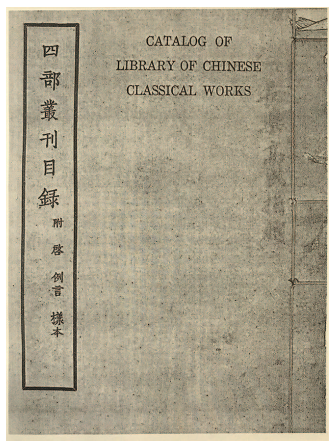
为影印《道藏》，商务早早开始筹备物料、人员，所以到1918年底，看到《道藏》之事无望，张元济提议“不如竟印《四部举要》”。相比《道藏》收藏在宗教机构，关系较远，变数太多，《四部》的影印依托藏书圈支持，而且这个计划也筹备已久，早在1915、16年，已经有张元济与郑孝胥、缪荃孙讨论《四部举要》选目的记录。1918年12月18日的日记里，张元济做了几项算数，一是《四部举要》的石印工作进度：除廿四史外17万页，28400石，每日40石，两年可以完工；二是成本、定价、利润，这里转写成表格：

用纸	成本	连廿四史定价	除廿四史定价
白纸	270	450	340
黄纸	215	360	250

这样粗算来，若销售“千部”可以赚“15万元”；“六百部”可以回本；不足六百，“每减百部”蚀本“38000余元”。

这时候傅增湘来信商量《道藏》选印，张元济便表示将以《四部》为先，选印《道藏》不可妨碍《四部》工事。但他却同时与鲍咸昌仔细计算了影印全部《道藏》和《四部丛刊》需要如何调配工人与机器、所需工时如何，并把这些都记录在日记里。《道藏》的页数和印量都小于《四部丛刊》，按他们的安排，需要19个月印完《道藏》，再加11个月印完《四部丛刊》。

在销售策略上，张元济所虑更多。他坚拒了《道藏》“先售预约，不及百部即还款停印”的建议，担心《道藏》预售若生波折，会打击《四部》的预售。《四



《四部丛刊目录》

部》体量大，必然定价高，又包含各部基本典籍，销路明显广于《道藏》，更应在销售上优先考虑。

善本还是普及本

4月10日，张元济把《四部丛刊》选目寄给傅增湘，此前他们决定“删去金石、书画、目录及类书各门，多加别集”。这天日记的发信一栏特别详细地注明了这封信的内容：“告知衲《鉴》(百衲本《通鑑》)棉纸即运，又《北山录》旧纸尺寸太小，又《四部丛刊》目，又影片免税。”我们几乎只能理解这条注释实际上是在提醒自己第三件事，为了方便日后回忆而记录了同一封信里的各项内容。因为另外几件都是关于古籍影印的常见事项，在张、傅二人的通信中没什么稀奇。可惜这封信没有留下来，我们只能看到一周后张元济的另一封去信，在信末又叮嘱“《四部丛刊》目，有暇祈核阅并教正”。那封信里主要告知百衲本《通鑑》预售的情况，预定了三百五十余部，这个成绩令张信心十足，已经在计划“售完之后如尚有人欲得之，拟专印阔大之本，并用佳纸，庶于目前加价发售无所妨碍”。实际上，旧籍影印不乏关心与购买者，当时正要离开军队回到巴黎学术界在上海中转的伯希和，就告诉张元济，《四部丛刊》和《道藏》，他想各买一部。

大约在这段时间，叶德辉就《四部丛刊》选择版本的方针致函夏剑丞，版本大致有三类：旧本(古本、善本)、校刻本、注释本。叶希望“每种书三本兼采”，如果一定要只选一种，“惟有存旧本去校、注本，俾读者先得有用之本，再别求参考之书”。

6月2日，张元济接到叶德辉来信，叶建议《四部丛刊》如需借他处藏书影印，应“尽就近易借者借之较简便，亦较迅速”，“总以借得瞿书为功之半，江南图书馆次之”。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建立起的“涵芬楼”，十几年来收购古籍数目可观，

但还无法与晚清四大藏书楼的规模相提并论。这四个藏书楼中，杨氏海源阁在山东聊城，既无旧交，也路远不便；陆氏皕宋楼藏书已在十几年前售至日本；而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收购了丁氏八千卷楼的江南图书馆都在上海周边，这两处收藏的善本可以满足《四部丛刊》的多数需求。因为商务印书馆与南京军阀一直关系良好，借影江南图书馆藏本不成问题，叶德辉的主要建议是让张元济再托缪荃孙联络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传人瞿启甲(良士)。缪荃孙是光绪朝进士，曾任国史院总纂，先后创办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当时流寓上海，也是《四部丛刊》最早的发起者之一。

缪荃孙向张元济谈起《四部丛刊》选本的方针。缪认为“尤以不拘《书目答问》本子为最要”。《书目答问》是当时最重要的工具书，直到今天也是目录学经典著作，题为张之洞所作，实际上是缪荃孙代办。缪说当时作《书目答问》“以通行本子为目的，使人易得”，但对于现在将要影印的《四部丛刊》，他主张“现新出好本多于往时，尤以精本为主矣”。关于版本方针，矛盾回忆商务印书馆内的“当权者派”主张选用善本影印，但也有人主张用铅字排印更便利和普及的带有考证汇注的本子，这就是《书目答问》会为一般读书人入门所首先推荐的版本，他们还讥讽前者是“制造假古董者”，双方争论近半年之久。

其实无论使用哪种方案，对于中国古籍的出版而言都将是一个创举。但是，当时恐怕再没有其他出版人能像张元济那样与旧书业、藏书家有深刻的交往，能够合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企业之力汇集善本加以影印了。商务的《四部丛刊》最终选择前一方案，而中华几乎同时推出的《四部备要》丛书则基本是后一方案。

确定选取善本的版本方针后，另一个问题则是收录哪些书。8月，张元济与沈曾植、缪荃孙讨论《四部丛刊》书目，沈、缪两人都提出经史子集四部中，前三部选书过少，而且前三部内无清人著作，集部却有很多清人文集，也显得体例驳杂。因此打算删去清人的文集，增加宋金元人文集，也可以收入一些两宋词家专集。

对这个做法，后来叶德辉又写信讨论。他说“为流通古书起见，不得不有利市之心，但利市之法在投人所好”，而当时人们普遍重视清人诗文集，如果能“类聚一编，触手皆备”，一定会吸引购买。《四部丛刊》的定位是精善之本，很大程度上就

是宋元旧本，清人著作在这种版本定位下有些尴尬。叶德辉提出，“只宜取有用之书，兼及宋元明本，不能因有宋元明本，遍印不急之书”。

藏书家“知其必不长为己物”

叶德辉、缪荃孙代为联络瞿氏后，10月9日，张元济与叶德辉、孙毓修启程到常熟拜访铁琴铜剑楼。这是张与瞿的初次见面。后来，张元济与瞿氏父子围绕善本影印展开了十数年交往。

而联络铁琴铜剑楼主人的缪荃孙，1919年初曾重病，“呕血盈盆”，幸亏医治及时，逐渐恢复，但也卧床数月，精神今非昔比。6月缪荃孙给张元济的信谈到“病后万念俱灰”，刻书工作亦拟停息，又欲售书数种与商务印书馆。本来双方协定1800元，但过了一阵，缪又因为在讨价还价时搭入了一部《剡源集》而后悔。与缪接洽的孙毓修向张元济商量此事。这部《剡源集》是何焯借得明嘉靖以前旧抄本校在此本之上，除了改正讹夺，还补足《唐画西域图记》后半和12篇佚文。不过这一校本已经在光绪年间刊刻。最后张、孙决定加价60元，购入这批藏书。

缪荃孙给自己的藏书做了详细的解题目录，因为他很早就相信藏书聚散无常。他自言是在庚子事变时第一次感到“如李易安所云‘四顾茫茫，盈箱溢篋，知其必不长为己物矣’”，因而决定自编书目，“他日书去而目或存，挂一名于《艺文志》，庶不负好书若渴之苦心耳”。缪荃孙先编成《藏书记》，后来又有《续集》与《再续集》。《藏书记》印成后，张之洞曾问缪：不畏人指名而索耶？缪则回答：“本是待价而沽耳。”后来书归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应是很理想的归宿了。谁又能料到十余年后，东方图书馆与涵芬楼的藏书竟被付之一炬。

12月，缪荃孙病重，21日早间张元济登门拜访，“其家人以垂危告”，又见到“门内置纸糊轿马多件，似已预备后事”。次日，缪荃孙去世。张元济撰挽联回顾与缪的交往，题记：“壬辰通籍，甲午先生归田，奉教之日浅。辛、壬间先生载书来沪，互通通假，获益不少。山水遽坏，能弗法然。”

1919年尾，筹备数年的《四部丛刊》终于撰定印行启事，由王秉恩、沈曾植等25人署名。署名后识云“缪筱珊先生提倡最先，未观厥成，遽归道山，谨志于此，以不没其盛心”。